

# 台灣歷史記憶與文學的重建問題

陳芳明<sup>\*</sup>

## 壹、引言

跨世紀的新政府形成之際，台灣歷史記憶與文學研究的重建問題，需要更為深沉的思考。從一九八七年戒嚴體制的終結，到二〇〇〇年陳水扁政府的建立，這十餘年間有一個重要的人文發展趨勢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隨著本土意識的日益高漲，有關台灣歷史與文學的研究漸漸獲得釋放的空間。這是相當典型的後殖民文化現象。

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是一個重要分水嶺。在終戰之前，一般史家都將之劃歸為殖民時期。因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部份淪為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戰爭結束，這些殖民地紛紛宣告獨立，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主權與文化主體。對這種脫殖民的普遍現象，史學家將之劃歸為後殖民時期。在後殖民的國度，知識份子開始檢討曾經發生過的殖民經驗，並且對這種經驗所帶來的文化傷害進行分析、研究並詮釋。這種深刻的歷史反省，是一種心靈的洗滌與昇華，也是在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過程中極為重要課題。

台灣社會的後殖民時期，並不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結。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以後立即實施的戒嚴體制，無論就權力結構或文化支配而言，都與殖民體制無分軒輊。因此，當世界歷史在戰後開始進入後殖民的階段之際，台灣社會實質上邁向了另一個再殖民的階段。台灣知識分子無法像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那樣，能夠反省曾經有過的殖民經驗。相反的，在進入後殖民時期以後，反而患有更為嚴重的歷史失憶症與文化失語症。因此，台灣後殖民時期的到來，較諸世界史發展的速度還要遲到四十年。必須等到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之後，台灣社會才獲得檢討殖民經驗的從容空間。

---

<sup>\*</sup> 本文作者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高度的權力支配之下，台灣知識份子通過長期的民主運動而蓄積旺盛的批判力量。這股批判力量是結合強烈的台灣／本土意識而展開的。幾乎可以說，民主運動的崛起，以至蓬勃發展，全然是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為了達到去殖民的目標，民主運動似乎是放在本土精神與外來政權之間對抗的脈絡上而進行的。從民主進步黨的建黨成功，就可得到印證。它一方面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產物，一方面也是長期潛藏於社會內部的悲情歷史意識之產物。也就是說，中產階級的主觀願望與歷史情境的客觀條件，促使民主運動成為戰後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

陳水扁政府的誕生，使台灣意識的發展臻於高峰。無論稱這樣的意識為命運共同體，或是台灣民族主義，現階段的人文工作者顯然面對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究竟是要繼續保持台灣意識的受難心態，還是要使之成為一種昇華的、包容的民族主義？這個問題牽涉到日後台灣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而更重要的，也牽涉到整個台灣文化主體重建的基本態度。這篇報告的提出，在於迎接人文思考的新時期到來之際，以台灣文學研究者與散學者的身份表達個人的一些關切。

## 貳、承認台灣文化的混融性

二十世紀台灣歷史的發展軌跡，如果可以使用殖民時期與後殖民時期來概括的話，則台灣文化是殖民地文化的說法應該是能夠接受的。事實上，如果把歷史發展繼續往上追溯的話，殖民地文化的性格是相當顯著的。從文學傳統的角度來看，立刻就可發現每一階段的文學內容，都未能以相應的歷史經驗為基礎。下列的簡單對照表，當可得到印證：

原住民文學	荷蘭經驗與漢人經驗
古典文學傳統	滿清經驗
新文學運動	日本經驗
現代文學	中國經驗

台灣島上最初的文學活動，必然都是屬於原住民的。由於原住民沒有文學，文學傳播方式依賴的是口耳相傳。原住民文學富於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乃是建基於部落社會的文化。然而，原住民文學開始文學化以後，也開始進入所謂殖民文化的時期。殖民的荷人與移民的漢人，依據他們的思考方式與文學書寫使原住民文學留下紀錄。那種記錄的過程，事實上已有權力支配隱藏其中。漢人移民社會成熟之後，古典漢詩也開始在島上傳播。不過，漢詩的書寫大多出自滿清政府派遣來台的遊宦。他們以帝國眼睛凝視台灣所創造出來的文學想像，往往與客觀現實有很大的落差。等到十九世紀台灣本土的古典詩人誕生之後，他們的藝術成就與美學經營則始終未能獲得彰顯的機會。

日據時期的新文學運動，是在高度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啟蒙的刺激之下而產生的。然而，資本主義體制與現代化運動卻是伴隨日本殖民統治而引進台灣。質言之，資本主義與現代化事實上是屬於帝國主義無可分割的一環。台灣新興知識份子在接受現代化啟蒙之餘，已警覺到要利用文學形式來抵抗殖民統治的權力支配。參與新文學運動的知識份子，一方面知道現代化是無可抵擋的趨勢，一方面又強烈意識到現代化與殖民化之間的學生關係。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裡往往充滿了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緒，來呈現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接受。

到了戰後，國民政府施行高度的國語政策，迫使日據時期的反殖民文學傳統產生了斷裂。從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以中國文化為取向的人文思維，以霸權的地位支配了知識份子的思考。在這段時期，台灣社會的歷史記憶與文學傳統都受到有計劃的壓制與擦拭，這正是殖民統治的一種變相延伸。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中產階級的出現，沒有民主運動的崛起，戰後殖民式的戒嚴體制絕對不可能得到鬆綁。反諷的是，戰後資本主義的擴張，並非是來自社會內部的自發性釀造；而且在反共政策下，台灣社會被台灣、美國資本主義的陣營。在七十年代即土文學崛起之前，台灣作家的思考並非立基在台灣社會主體之上。

從上面的扼要敘述，當可理解在歷史上的每一階段，台灣文學都無可避免受到殖民式的權力干涉。以中國思考為中心的戒嚴體制，是在國際社會的日益孤立的情況下而開始有了鬆動。台灣民主運動便是在中國體制的合法性危機不斷升高之後，取得了挑戰的機會。台灣文學之回歸本土，無疑是與草根性民主運動桴鼓相應地同時進行。

以強烈的台灣意識為基礎，不僅使文學運動自七十年代以降有了可觀的進展，也使民主運動在八十年代完成了建黨的任務。在這段期間，台灣意識的凝鑄，大多是訴諸於悲情的殖民歷史經驗。這是可以理解的、悲情的、受難的訴求，適足劃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界線。強調剝削掠奪的史實，不僅在於團結台灣住民的命運連帶感，同時也在於揭露權力支配者的殖民性格。從階段性的策略來考量，台灣意識的鍛造有其必要性。為了對抗中國大敘述，台灣文學工作者也發展另一套台灣大敘述。亦即以台灣民族主義來挑戰中華民族主義，以此發展出來的文學想像與國族認同，成為抗爭階段的有力雄辯。

就去殖民的工作而言，台灣意識的論述突破了封閉式壟斷式的中國霸權論述，不過，整個社會朝向開放的境界邁進時，台灣意識似乎也有可能重蹈覆轍，成為封閉式壟斷式的思考。台灣意識畢竟是日本原住民的歷史記憶為基礎而塑造起來的，這樣的記憶並不能與原住民、外省族群共同分享。倘然台灣意識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原主，則面對後殖民時期的到來，就必須考量如何讓這樣的意識與不同的族群所共同接受。尤其是象徵本土政權的新政府即將誕生時，可以預見的，台灣意識將會成為主流論述。台灣意識，在封閉與開放之間的選擇，已到了重要的關鍵時刻。

殖民地文化的特色，在於它具備高度的混融性。所謂混融性是指本土文化在受到外來殖民者的統治之後，原來的主體性與特殊性受到強勢文化的滲透。殖民母國的語言、思想與本土語言、思想糅雜在一起。因此，要在殖民地文化中尋找純粹的、本質的、正統的本地文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台灣語言的後殖民現象是最鮮明的證據。每一種母語都與不同的外來語混雜在一起，

既有屬於日語的，也有國語的，更有英語的。同樣的，本土語言也會滲透於優勢的殖民者語言之中。例如台式日語、台式國語的存在並廣泛使用，便是具體的例證。

台灣意識論者必須承認這種混融性的事實。因為，這種殖民文化的形成，是一種歷史經驗的長期累積。台灣社會經歷多少不同階段的殖民統治，就有多少不同的外來強勢文化殘存於本土文化之中。具體而言，殖民經驗乃是建構台灣文化主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無論是受害的，或是受惠的，都深深烙印在本土文化的靈魂內部。在台灣文學史上，固然有屬於本土的原住民語、福佬語、客家語等等的作品存在。但是，因為經歷過不同的歷史階級，與殖民者權力支配極為接近的古典漢語、日語文、日語、北京話等等的作品也相當豐富地構成台灣文學的傳統。

台灣文化的混融性如果是可以接受的，則殖民地文化所延伸出來的歷史記憶也應該是混融的。台灣歷史記憶的建構，是由不同族群、階級、性別共同凝聚起來的。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性別，各自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在不同的歷史記憶基礎上，也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文化認同。殖民統治者，往往利用其優越的權力支配地位，以其主觀的歷史記憶來取代被殖民者的歷史記憶，這種支配性的歷史記憶，憑藉的是檢查制度、警察力量、傳媒掌控與教育體系而得以擴散。台灣社會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患有歷史失憶症，無非是屬於一種強制性的集體遺忘。

沒有任何一個族群、階級、性別的記憶是能夠相互取代。每一種記憶都應該是獨一無二的，而且應該是獲得尊重的。在倡言重建文化主體的今天，歷史記憶的恢復與再建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社會內部的每一族群、階級、性別記憶，都應該有獲得釋放的空間。所有的記憶都是組成台灣文化主體的主要因素成分。

### 參、從族群、階級、性別的脈絡重建主體

在殖民時期與再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權力支配者是一種偏頗的主流價

值。就日據時期而言，權力支配基本上是以日本人、資本家、男性的三重結構形式呈現出來。這種牢固的結構，到了戰後的再殖民時期並沒有受到重大的改變，除了種族的性質改變之外，支配性的主流價值並未改變，亦即以漢人、資本家、男性的三重結構繼續存在。無論是日本人——資本家——男性的結構，或是漢人——資本家——男性的結構，都可以發現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主流價值，最後都無可避免會演變成為霸權論述。

霸權論述是一種排他性、壓倒性的思考方式，而且是一種滲透成為理所當然的思考方式。日據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是在資本主義日益成熟的發展過程中接受現代化的教育。他們意識到現代化為台灣社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進步與解放；但是他們也頗為警覺，現代化本身也同時在為日本人的殖民化護航。以新文學的發展為例，就可發現作家賴和、楊達、台赫若等人，對於現代化如醫學、法律等等層面的提昇往往在他們的小說中予以正面肯定。然而，小說裡也透露一股強烈的矛盾，因為他們也領會到，醫學法律的推廣，實際上也是殖民體制的變相擴張。

接受日語教育越深的知識份子，越容易感受到現代化的好處，但是也越輕易遺忘殖民權力的支配。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發生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最能反映知識份子在日本霸權論述下的抗拒與批判。這一論戰產生的背景，起因於日本資本主義在這段時期發生了嚴重的危機，整個台灣社會出現了失業浪潮。面對危疑的時代，作家強烈表達重建台灣文學主體的迫切感。以黃石輝、郭秋生、賴明弘為主軸的知識份子，特別揭示提倡鄉土文學觀念的重要性。他們強調，要對抗日本人／資本家的殖民體制，作家有必要使用台灣話文，從事鄉土文學的創作。

他們的抵抗策略是很清楚的，鄉土文學的路線是為凸顯台灣人的民族特色，用以區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種族等級界線。台灣話文的提倡，則是為了讓文學與大眾結合起來。使用本土的共通語言，也是為喚醒台灣人的階級意識。這種語文策略，具有普羅階級的色彩，其目的在於對抗資本主義的體制。因此，在對抗殖民者的日本人——資本家——男性的三重權力結構

時，台灣鄉土文學作家的優先批判對象是國族認同與階級認同的問題，至於性別議題在整個論戰的過程中，是隱晦不見的。這個事實說明，在那樣的歷史階段，知識份子追求文學主體的重建時，對於立即而明顯的權力支配、批判的態度特別強悍。至於性別議題的位階，則置放在較為次要的層級。這是因為知識份子清一色由男性所構成，未能意識到父權文化操作所帶來的壓迫。由於歷史條件侷限，當時文化主體的再建構並未照顧到它的完整性。

這種情況，到了戰後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再以爆發時，顯然使人又有一種歷史重演的錯覺。無論就論戰的背景與內容而言，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與三〇年代的情況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從權力支配的建構與解構的觀點來看，兩次論戰的思考模式頗具異曲同工之妙。

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發生，並非資本主義面臨了危機，而是國民政府所賴以生存的中國體制產生空前未有的鬆動現象。如前所述，強烈富有再殖民性格的中國體制，是以中國人（漢人）——資本家——男性的三重權力結構而存在的。台灣作家感受到這塊島嶼的國際地位日益縮於孤立之際，開始對文化主體的重建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在論戰中對峙得最為緊張的問題，莫過於現代主義文學陣營與鄉土文學陣營之間的抗衡。

鄉土作家的美學追求，係以寫實主義的精神為基礎。他們認為現代主義乃是因為台灣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配，因而在文化上淪為被殖民的地位。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依照鄉土作家的思考方式來看，其實是美帝國主義的買辦或代理人。鄉土文學陣營認為，現代主義的文學，只是在複製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空虛與苦悶，對於台灣社會所遭逢的政治危機與社會矛盾可謂渾然不覺。整個論戰的過程，顯示台灣作家在思考文化主體再建構的問題時，關心的仍然是國族認同與階級認同。性別的認同的議題，在論戰中幾乎是缺席的。

無可否認的，長期在霸權支配的陰影之下，台灣知識份子對抗文化主體的再建有著相當焦慮的思索。從三〇年代與七〇年代的兩次鄉土文學論戰內容來看，國族的認同一直是置於最優先的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權力支配

者在建立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時，俞重以大敘述的方式來灌輸國族認同的思考。雄偉的英雄史觀、悲壯的歷史事件，一直是當權者表達大敘述時最為習慣的思考重心。被殖民者、被支配者從事抵抗與批判的工作時，也自然而然在大敘述的基礎上進行反向思考。亦即以另一種大敘述的形式表達抗拒的立場。日據時代台灣意識的凝結，便是為了對抗大和民族主義的霸權地位；而戰後台灣意識的鍛鑄，也是為了對抗中華民族主義的宰制地位。先後浮現出來的台灣意識，雖然是從被壓迫的立場出發，卻也同樣訴諸英雄史觀與歷史事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美麗島事件等等的記憶重建，都不脫離大敘述的思考模式。

大敘述式的對抗策略，有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使既存的殖民威權體制產生鬆動，是台灣意識最直接的政治效應。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雖然未有輸贏成敗的結果，卻相當鮮明地在官方文藝政策與民間文學思考之間劃清界線。以這樣的區隔為基礎，八〇年代初期延伸出來的文學統獨論戰就非常成功地使台灣主體性獲得清楚的确立。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能夠一分为二，便是在統獨論戰中確立了歷史的里程碑。

但是，不能不注意的是，台灣意識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持續成長，始終是與本土性、草根性的民主運動相偕前進。在最近二十年，台灣意識的發展穿越了一個極為關鍵性的歷史門檻，那就是一九八七年的解嚴。通過解嚴的儀式，台灣民主運動取得了相當可觀的合法性。同樣的，伴隨民主運動一起成長的台灣意識也同樣獲得合法地位。合法的基礎，乃是建立在社會大眾的認同與支持之上。台灣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在解嚴後的長足發展是有目共睹的。經過不斷的書寫、研究，以及再評價，歷史上發生過的苦難與痛苦，都在這段期間次第獲得洗滌。台灣心靈的昇華，在這二十年之間，是一個普遍追求的方向。這個方向既已成為必然的趨勢，則歷史是不可能容許倒退的。

要讓歷史繼續前進，要讓社會繼續開放，就應該創造前進與開放的條件。文化主體的重建，絕對不能淪為標語或口號。如果一個社會裡，特定的族群、特定的性別仍然受到偏頗的待遇時，則文化主體再建構的努力，必然

是殘缺不全的。在新政府揭示政黨輪替與全民政府的精神時，其權力結構是否開始進行變革式的調整？如果所謂政黨輪替之後的人文思考，乃是從中國人——資本家——男性的三重結構，轉換成為台灣人——資本家——男性的權力支配，則這種模式仍然是停留在舊思維的階段。新思維的誕生，必須在舊有的三重權力結構的格局中脫殼而出。

#### 肆、維持社會內部的批判活力

新政府時代的到來，文化主體重建的目標似乎已經在望。不過，這樣的期待不能過於樂觀。新政府的女性閣員較諸舊政權，在數量上有了顯著的增加；但這並不意味台灣的人文思考也有了質的改變。

這裡必須提醒的是，與三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思考對照之下，現階段的知識份子相當欠缺階級議題與性別議題的思考。這種現象是可以理解的。資本主義在八十年代的飛躍性發展，使台灣社會的右翼思考越來越鞏固。誠然，沒有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就不可能孕育堅強的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的改革要求，就不可能催生民主運動；沒有民主運動的持續追求，就不可能完成反對黨的建立；如果沒有反對黨的突破政治格局，就不可能迫使戒嚴體制宣告終結。這種連鎖性的歷史進程，都與資本主義的右翼思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樣的，反對運動中的中產階級幾乎都是由男性組成，父權文化經過政治運動的鍛鍊，也更形結實頑固。右翼思考與男性思考，注入文化主體再建構的運動中，便潛藏了相當嚴重的人文危機。

右翼／男性的民主運動宣告勝利時，左翼的思考恐怕會更將淡化而衰弱。從前在反共時代，左翼運動是在強制性的威權宰制下被迫消逝的。如今，左翼的人文思考則是自然消亡的。欠缺「左」的思考，將會使社會內部的批判力量削弱。所謂左翼思考當不止於階級議題的提出而已，它關心不會只是停留在農民、工人的身份之上，而是擴及資本主義體制下所有的弱勢族群。因此，左翼思考應該是包括了農工階級之外的沒有發言權的島上住民，亦即原住民、老人、外省老兵、女性、殘障、同志，都容納在「左」的關切對象

中。甚至環保議題，也應包括在左的批判精神之內。這些人沒有發言權的根源，乃在於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勝出，與資本主義之優勢強化有了堅固的結合。

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已經遠離戒嚴的反共體制，但是左翼的史研究與文學研究並未有復甦的跡象。如此傾斜的學術風氣，並不能有助文化主體的重建。

文化的再建構，必須在主體性（subjectivity）與整體性（totality）兩方面相互兼顧。整體性的照顧，便是涵蓋族群、性別、階級等之層面的議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左的思考不但欠缺，性別議題也有待加強。

自八十年代以降，女性意識文學的大量的崛起，正好可以說明台灣社會的性別議題已開始在文化主體重建的運動中提上了日程表。女性文學的批判對象是父權文化，亦即所謂男性中心論。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其他不同議題的文學，也在大量生產之中。同志文學的蓬勃現象，乃在於挑戰異性戀中心論。眷村文學的抬頭，則在於挑戰福佬文化中心論。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更在於批判漢人文化中心論。這種種文學思考的活動，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便是挑戰權力的壟斷與支配。

對於這種去中心的解構思潮，有人將之命名為後現代文化現象。不過，台灣社會經過長期殖民／再殖民的統治，追求的當不止於權力的解構（deconstruction），而且也在追求主體的重建（reconstruction）。因此，八十年代的文學批判運動，應該是屬於後殖民的文化現象。然而，無論是後現代或是後殖民，台灣社會之朝向開放與再開放，已是任何政治力量無法遏止的。

現階段這些議題的追求，應該是隨著新政府的形成而繼續發展下去。不過，在目前較為迫切的問題，乃在於研究環境必須要加速改善。十餘年來，台灣研究一直被冠以「顯學」的標籤。從這個標籤來看，彷彿台灣研究的地位已經穩固，在資源上也已經非常充沛。這種看法，與現實有很大的落差。事實上，台灣研究仍然停留在「險學」的階段。僅從學院的課程設計而言，

當可理解目前台灣研究的處境。

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的開設，在每個大專院校的中國文學系裡都已普遍化了。這種普遍現象，是「顯學」一詞的主要根源。從實際的研究經驗來看，這樣的課程設計的是非常偏頗的。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劃分得相當細膩，從詩經、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等主題，各有專業的課程設計。其他像志怪、傳奇、戲曲、話本、小說等等，也是特定的研究領域。中國文學源遠流長，需要大量的課程才能完整容納，這是能夠理解的。但是，凡是涉及台灣文學的研究，卻只以一門「台灣文學」予以處理。原住民文學、古典漢詩文學、日據新文學、戰後現代文學，無論從族群或語言的內容來看，性質相互歧異。這些課程有必要以各自專業的領域去設計，而不是以含混的「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一詞概括。

台灣文學能夠進入大學殿堂，乃是台灣意識高漲以後的結果；然而，現階段台灣文學課程設計的方式，則是中國意識支配的殘餘。目前中文系的最大危機在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教授要找指導的學生，越來越困難；而台灣文學研究的學生，要找指導的教授，也越來越困難。這是中文系所面臨的雙重危機，也是解嚴後台灣文化主體重建過程中所遭遇的一個困境。台灣文學的課程需要重新設計，不僅要照顧到歷史階段的不同性格，也要照顧到文學內容的不同議題。

跨世紀的台灣文化，將會因台灣民族主義的成熟而有全新的思維。一個具有主體性的文化，絕對不會發展出傷害性、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必須在開放、多元的基礎上去解決。專斷式、壟斷式的權力支配，應該轉化成為民主式、開放式的權力分配。從這樣的立場的出發，曾經受害的台灣歷史，才有可能昇華成為受惠的文化遺產。